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英] 斯蒂文·朗西曼 著  
Steven Runciman

马千 译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CAMBRIDGE

#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英] 斯蒂文·朗西曼 著  
Steven Runciman

马千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453: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 (英) 朗西曼著; 马千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7

书名原文: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ISBN 978-7-80769-683-4

I. ① 1… II. ①朗… ②马… III. ①拜占庭帝国—中世纪史 IV. ① 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6819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3-8764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ISBN-13: 9780521398329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Beijing Times Chinese Press [2014]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Beijing Times Chinese Press.

本书简体字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包括香港, 澳门和台湾) 出版发行。

##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著 者 | [英] 斯蒂文·朗西曼

译 者 | 马 千

出 版 人 | 田海明 周殿富

总 策 划 | 武 学

策 划 编 辑 | 张 晓 辉

责 任 编 辑 | 武 学

执 行 编 辑 | 郭 伟 娜

装 帧 设 计 | 未 氓

责 任 印 制 | 刘 银 晔 敬

营 销 推 广 | 赵 秀 彦 陶 源 源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695×995mm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255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683-4

定 价 |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

我与马千同志素昧平生，至今也未能谋面。但我们神交已久，通过网络探讨眼前这本书有很长时间了，因此他多次来信希望我能为新书的面世写个序言，我欣然同意。之所以打破了我只为自己的学生出书写序言的惯例，原因还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阅读过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 1903–2000）的多本作品，其中包括这本书，作为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初学者，当时便深有感悟。

最深的感悟是作品具有的浪漫情调，远非学院派著作可比，不仅读起来平实无华朗朗上口，毫无学究气，而且内容易懂贯通性强，凸显学养之厚重。他的作品在国际拜占庭学界浩繁的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果不是独树一帜的话，那也称得上是特立独行。我不知道翻译者马千同志是如何看中了这样一本好书，因为据我所知，他并非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的专门研究者，但是他独具慧眼挑选了朗西曼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花了几年的时间和精力认真翻译全书，使我意外地遇到了一位知音。可以想象，马千同志作为拜占庭史的爱好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扫除大量专业术语的障碍，而且其用功之勤令人赞叹佩服。作为我国拜占庭学界的一名老兵，我在祝贺他为我国拜占庭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同时，从内心深处感到一定要向他学习，为推进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工作。

斯蒂文·朗西曼作品的独特性透射出这位英国拜占庭学者的传奇人生。这位长寿学者出身世家，父母都是工党议会成员，祖父是富有的船商。他自幼聪颖

过人，记忆力超群，5岁即能背诵荷马史诗和拉丁古诗，其天赋的语言才能日后更是表露无遗，据说他不仅可以讲拉丁、希腊等欧洲所有语言，而且可以读懂土耳其、叙利亚、阿拉伯、波斯、希伯来、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古语。当年他拜英国拜占庭研究院派奠基人 J. B. 伯里（J. B. Bury, 1861-1927）为师时，就是以多种语言能力进入师门，成为伯里唯一的研究生弟子。在大师熏陶下，他在名校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刻苦读书，默默成长为顶尖的拜占庭学家。他秉承名师伯里的衣钵，成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接受了祖父的巨额遗产，放弃了三一学院优厚的待遇，辞职周游世界。在战争期间，他于1942-1945年任教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担任拜占庭艺术和历史教授，同时尽情考察游历东地中海古迹名胜。这位老派学者阅历丰富，生活自由潇洒，在外人看来无拘无束多少有些古怪，他曾为我国末代皇帝溥仪弹奏钢琴，为埃及福亚德国王讲解塔罗牌，还在伊斯坦布尔的佩拉酒店遭到德军流弹袭击受伤，在拉斯维加斯投币老虎机上两次中彩，这些经历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他长寿而多产，其20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国际拜占庭学界牢不可破的地位，他活动在学院派体制外也并不影响其国际声誉，笔者于1984年在希腊留学期间有幸聆听他的演讲，并主动讨教，其诙谐幽默的回答闪烁着英国绅士的智慧，至今犹历历在目。相信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能够联想到这位睿智的作者，从中获得更多的乐趣。

陈志强<sup>①</sup>

---

① 陈志强，南开大学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学）成员，继著名学者罗念生之后，第二位“希腊最高文学艺术奖勋章”获得者。拜占庭历史与文化是陈教授的研究方向之一，他以中文、英文和希腊文撰写论文和学术文章近百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考古》等国内外历史专业刊物上，撰写和出版了《拜占廷学研究》《盛世余晖——拜占廷文明探秘》《拜占廷文明》《中文史书中关于罗马希腊世界的资料》《君士坦丁堡陷落记》《4-15世纪中国和拜占廷关系史研究》等著作。

## 译 序

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代表着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落幕，新兴伊斯兰强权的崛起，更为欧洲、近东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变化，甚至一度被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除此之外，在长达7周的战役中，双方不论民族、信仰，均表现出惊人的英雄气节与坚韧，荡气回肠，令人动容。故而，数百年来它受到西方历史学家的持续关注。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题材，国内相关资料却凤毛麟角，几乎成为一项空白。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斯蒂文·朗西曼196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在大量西方同类专著中，该书结构清晰，考据严谨，文笔典雅，篇幅适中，已成为此领域备受推崇的权威著作之一。相信对国内读者而言，此书的译介会对探究那段历史大有裨益。

斯蒂文·朗西曼爵士(Sir James Cochran Stevenson Runciman CH, 通常称为Steven Runciman, 1903-2000), 英国知名历史学家。他出身名门。父亲为第一代多克斯福德子爵沃尔特·朗西曼(Walter Runciman, 1st Viscount Runciman of Doxford), 同时也是英国自由党重要政治家、国会议员。斯蒂文是家中次子, 天资聪慧, 自幼好学, 据说5岁便已通识拉丁语、古希腊语, 随即先后就读于伊顿公学(期间与大文豪乔治·奥威尔成为同学及挚友)、剑桥三一学院。他在剑

桥期间师从爱尔兰裔拜占庭史专家 J. B. 伯里，并成为后者毕生最得意的弟子。朗西曼在语言方面极具天赋，除英语、拉丁语、希腊语之外，还精通俄语、保加利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叙利亚语、希伯来语、格鲁吉亚语。据说其导师 J. B. 伯里原本已经半退隐，无意再收录这名弟子，当朗西曼毛遂自荐说通晓俄语后，便特意“刁难”，将厚厚一沓保加利亚语文献交予编辑翻译，不料朗西曼居然牛刀小试，游刃有余，令伯里刮目相看。三十年代末，朗西曼继承了祖父的大笔遗产，开始了其游学生涯。1942年至1945年，他作为拜占庭艺术史教授任职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期间对十字军史开始产生浓厚兴趣，经过近十年酝酿，在1951—1954年陆续出版了三卷本《十字军史》，一举奠定了其学术地位，至今依然是十字军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朗西曼先生著述颇丰，除十字军历史题材外，其余多与中世纪拜占庭及其周边国度（如西西里、叙利亚）有关。1965年的《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他又一杰作，经久不衰，迄今已重印18次之多。1983年，因朗西曼在学术领域的卓越贡献，他荣获英国名誉勋位（Order of the Companions of Honour，1917年由英王乔治五世设立，用以表彰在科学、艺术、文学、政治、宗教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士，全球名额仅65名，获得者可在姓名后冠以CH字样）。

朗西曼先生语言造诣之深，书籍涉猎之广，令人叹为观止。本书引用了不同时期，不同语言的大量文献，构筑了一道完整、多角度的历史全景。与此同时，作者行文雍容流畅，娓娓道来，隐约透露出一股贵族之风，令人不忍释卷。然而本书毕竟出版于1965年，虽多次再版重印，但并未做重大修订，部分资料难免有陈旧之虞，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意在译注中引用了部分1965年后的参考文献，作为补充。《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涉及的时空范围，国人相对生疏，专有名词和术语的翻译可谓最大难点。正如朗西曼先生在前言中所说，由于大量人名地名是由各非英语词汇转译，他并不能保证无懈可击——有时作者信手拈来，其拼写便与现代通行的方式存在微妙差异。译者在力所能及范围，对各专有名词进行了考证，并按照国内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译名及《世界地名大

词典》《世界人名大词典》的规范予以翻译，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时在括号中附上原文拼写，方便读者查询。极个别未有规范汉语译名的人名地名，则保留原文形式。朗西曼原书主要面向西方读者，一些本应耳熟能详的历史背景，国内读者或许倍感陌生，对此译者尽量在译注中予以介绍，并附上参考文献。对于翻译考证过程中发现的个别原书错误，也在译注中一并指出（如君士坦丁堡城墙内外城台的名称错误、奥古斯塔广场的拼写错误等）。为与原注相区别：原注用①②③于页下排序，译注用[1][2][3]于书后统一排序。原书的参考书目中大部分文献为国内罕见，译者在译注中有意补充了一部分中文参考书籍，作为弥补。

朗西曼先生虽是英国学者，但在著作中对东方穆斯林、奥斯曼土耳其并无歧见，对其成就也多加颂扬。不过毕竟是深受古希腊罗马人文传统熏陶，对于拜占庭帝国的覆灭，对于其臣民亡国后的遭遇，作者也难免痛彻心扉，这一情绪在本书第十一章《战败者的命运》中有所流露，虽不宜苛责，但亦请读者细心甄别。

《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出版之际，译者要感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拜占庭史专家陈志强教授。陈教授《拜占廷帝国史》《拜占廷学研究》等著作一直是译者必备参考书籍，当译者在翻译中遇到疑难通过电邮冒昧求教时，陈志强教授虽与我素昧平生，却耐心点拨，热情鼓励，使译者有信心将译稿付与出版。本书的翻译完全是出于兴趣爱好，在此一并感谢家人对我长期的理解与包容。

译者不自量力翻译史籍名著，译文、注释难免有谬误、欠妥之处，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马千



## 前 言

昔日的历史学家们常常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然而今天的人们认为历史的长河中很难寻找出上述绝对的界限。在陷落发生前很长时间，意大利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已经兴起了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而在1453年之后很久，中世纪的思想依然在北欧盛行着。1453年以前开端的地理大发现已经深远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但尚需数十年其影响才能在欧洲充分显现。拜占庭的灭亡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自然与上述变化息息相关，但其影响并非立竿见影，当下立现。拜占庭的知识在文艺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1453年前半个多世纪，便有相当一部分拜占庭学者来到意大利谋求更好的发展，在这以后，同样有学者从异教徒的土地，甚至威尼斯治下的前拜占庭岛屿远赴欧洲“淘金”。奥斯曼实力的增长确实引发了意大利诸多商业城市的担忧，不过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没有立即终止东地中海贸易，受到显著影响的只有意大利至黑海的商业航线。对威尼斯而言，奥斯曼占据埃及的打击要剧烈得多，而对热那亚而言，其在意大利商业霸权的动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失去拜占庭商业区的损失。

即使从政治意义上看，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当时奥斯曼人已经抵达多瑙河岸并威胁中欧，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拜占庭首都难逃一劫——后者领土几乎萎缩至仅限衰败不堪的君士坦丁堡一隅，自然难以与占据了大半

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抗衡，何况土耳其还拥有那个时代欧洲最强劲战争机器。诚然，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对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刺激颇深。不过，那时的西欧诸国并无如此远见卓识，可以预料到奥斯曼的征服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并未因此显著改变其“东方政策”，甚至，他们是否具有一贯的“东方政策”都大为可疑。只有教皇或许表现出真正的不安与痛心，并开始策划反击，不过很快，更加迫在眉睫的危机就会到来了。

看上去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似乎不值得大书特书，不过对两类人而言，它还是至关重要的。于土耳其人来说，攻占该城不仅为他们带来了一座新都，还保证了帝国欧洲部分的安全。君士坦丁堡扼欧亚交界要道，且位于奥斯曼领土中心，若始终掌握在拜占庭异教徒手中，不免令奥斯曼人如鲠在喉。单独是希腊人固然不值得畏惧，但从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现一支基督教十字大军的可能，无疑会成为土耳其人挥之不去的梦魇。直到今天，经历了历史的兴衰变迁之后，土耳其人依然领有该城，他们在欧洲站稳了脚跟。

对希腊人而言，这一事件甚至更加令人刻骨铭心。这是希腊人一段历史的终结。灿烂的拜占庭在世界文明舞台闪烁了千年之久，1453年它虽已衰败，但尚能苟延残喘。虽然帝都的人口不断减少，但君士坦丁堡仍拥有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古罗马希腊学者。上帝的代言人，城中的罗马皇帝，令每一个希腊人自豪地感到，自己依然是一个伟大东正教国家的一员。此时的皇帝或许对臣民的实际意义甚微，但他依然地位尊贵且是上帝统治的象征。然而，随着皇帝与他的城市一同殉难，异教徒的统治开始，希腊人不得不为其生存而苦苦挣扎。所幸希腊文明并未消亡，这无疑源自其文明的内在活力与希腊人的勇气。

对我而言，君士坦丁堡陷落中的希腊人是一群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我的很多前辈对此也深有同感。例如吉本（Edward Gibbon）虽对拜占庭抱有偏见，但也赞许其末日中体现的气魄。而在埃德温·皮尔斯爵士（Sir Edwin Pears）六十年前出版的专著中，对希腊人的同情与赞誉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某些现代的研究令他的著作显得略微过时，但因其扎实的考据与渊博学识，此书在

今日仍颇值一读——我本人也深受其影响。当然，在这之后还有相当的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并取得成果。尤其在 19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500 周年之际，涌现了大量论文与著作。不过，除去 1914 年古斯塔夫·施伦贝格尔（Gustave Schlumberger）的专著与皮尔斯的作品，整整半个世纪，西方再没有关于这段历史的长篇专著出版。

在试图填补此项空白的尝试中，我借鉴了大量近代学者（不论在世或过世的）的相关著作，我将在注释中一一表达谢意。健在的希腊学者中，我尤其要提到扎基西诺斯（Zakythinos）教授与佐拉斯（Zoras）教授。在奥斯曼历史方面，我要特别感谢巴宾格尔（Franz Babinger）教授，虽然其名作《“征服者”穆罕默德与他的时代》并未详细注明参考书目。关于土耳其早期历史方面，维特克（Wittek）教授的专著对我帮助甚多。土耳其青年学者我则首推伊纳尔哲克（İnalçık, Inalçık）<sup>①</sup> 教授，而吉尔神父（Father Gill）关于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著作也具有相当价值。

我在附录中简要谈及了本书所用主要参考资料。其中一部分是比较罕见的。基督徒方面的文献，由德蒂尔（Dethier）教授在八十年前统一收录于《匈牙利历史文献》（*Monumenta Hungariae Historica*）中的两卷（二十一、二十二两卷之第一部、第二部）。它们虽然成功付梓，但并未公开出版，且包含不少错误。至于穆斯林方面的资料，由于普通读者阅读上的困难，更加令人难以亲近。我希望我能为读者们提供其中的精华部分。

若没有伦敦图书馆，本书将永远无法完成；我也要对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全体职员们的耐心帮助表示感谢。此外我不能不提到帕帕斯塔夫洛（S. J. Papastavrou）先生为本书进行的校对工作，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理事与职员们的宽容与友善。

① 本书人名、地名，译者举出原语源或异形拼法时，同时列出：前者为译者所附原文，后者为英文版拼写。——编者注

关于本书译名的说明：

我个人无法确保所有源自希腊语、土耳其语的译名均无懈可击。对希腊专有名词我尽量使用我个人认为常见、自然的形式。对土耳其专有名词我一般采用音译，除非是现代土耳其语词汇，后者我则使用现代土耳其语拼写。我将“征服者”苏丹的土耳其名称作 **Mehemet**，而非 **Mahomet** 或 **Mohammed**。我希望我的土耳其朋友能原谅我在书中使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一词而非“伊斯坦布尔”（**İstanbul, Istanbul**）——因为倘若那样做，未免有失之迂腐的嫌疑。<sup>[2]</sup>

斯蒂文·朗西曼

伦敦 1964 年

# 目 录

序 言 /1

译 序 /3

前 言 /6

第一章 帝国迟暮 /1

第二章 奥斯曼崛起 /20

第三章 皇帝与苏丹 /43

第四章 西援之殇 /56

第五章 准备围攻 /69

第六章 围城开始 /82

第七章 金角湾失守 /96

第八章 褪色的希望 /105

第九章 拜占庭的末日 /116

第十章 君士坦丁堡陷落 /126

第十一章 战败者的命运 /136

第十二章 欧洲与征服者 /150

第十三章 幸存者 /169

附录一 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主要参考资料 /179

附录二 征服之后的君士坦丁堡教堂 /186

译 注 /192

译者后记: 论书中一处地名错误 /219

参考文献 /230

索 引 /240

## 插图目录

- 图一 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 /44
- 图二 约翰八世皇帝 /45
- 图三 年轻时代的穆罕默德二世苏丹 /45
- 图四 博斯普鲁斯海峡。左侧建筑为小亚细亚堡，右侧为鲁梅里要塞 /60
- 图五 威尼斯画家詹蒂利·贝利尼为穆罕默德二世所作肖像画。/61
- 图六 君士坦丁堡地图 /84
- 图七 赛奥多西城墙 /86
- 图八 围城期间双方军队部署情况 /89
- 图九 三重的君士坦丁堡城墙 /106
- 图十 1艘威尼斯商船 /107
- 图十一 君士坦丁堡城墙 /122
- 图十二 特拉布宗城全景 /123
- 图十三 15世纪的希腊世界 /264

## 第一章 帝国迟暮

1400年圣诞节，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于伊森（Eltham）的行宫举行了一次宴会，不仅为了庆祝佳节，更重要的是为了欢迎他的一位特殊贵客——希腊人的皇帝（有时候也被称作罗马人的皇帝）曼努埃尔二世 [Manuel II Palaiologos (Palaeologus)]。后者已经游历了意大利，并曾于巴黎短暂驻留。期间法王查理六世一度将卢浮宫妆点一新，以款待这远道的贵宾，连索邦神学院（Sorbonne）<sup>[3]</sup>的教授们也因能与如此博学多识的帝王会晤交流而感到欢欣不已。

英国人为拜占庭人的高贵举止所倾倒，他们洁白如玉的长袍也令人们印象深刻。然而，尽管皇帝身份高贵，颇得好感，英法两国王公贵族们却只能令其败兴而归——皇帝此行专为祈求西方基督教国家援助，以对抗东方入侵的穆斯林异教徒而来，然而他的梦想落空了。亨利国王的大法官阿斯基的亚当（Adam of Usk）<sup>[4]</sup>回忆道：我细细思量，如此高贵的基督教贵族却被东方的萨拉森人逼迫得走投无路，以致要远赴西方乞援，这是多么可悲。哦，古罗马的荣耀如今何在？<sup>①</sup>

① Adam of Usk, *Chronicon* (ed. Thompson), p. 57; *Chronique du Religieux de Saint-Denis* (ed. Bellaguet), p. 756. 关于曼努埃尔此行的最佳记载见于：Vasiliev, 'The Journey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Manuel II Palaeologus in Western Europe' (in Russian), *Journal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 N.S., xxxix, pp. 41-78, 260-304. 亦可参见：Andreeva, 'Zur Reise Manuels II Palaiologos nach West-Europa',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Leipzig, 1892—(in progress) (以下简称 *B.Z.*), xxxiv, pp. 37-47. Halečki, 'Rome et Byzance en temps du grand Schisme d'Occident', *Collectio Theologica*, xviii, pp. 514 ff., 此书曾提及曼努埃尔于1402年拜会了教皇卜尼法斯九世（Boniface IX），但此说不足采信，不过曼努埃尔确于1404年向教宗派出了使节。Adam of Usk, *op. cit.* pp. 96-7.

确实，古罗马帝国早已今不如昔。虽然曼努埃尔是奥古斯都及君士坦丁光荣的继承人，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可以在罗马世界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然逝去。对西欧人而言，他们仅仅是希腊人或拜占庭的君主，已经无法与西欧新兴的君主们等量齐观。直到 11 世纪拜占庭依然是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是基督教世界抵御穆斯林冲击的中流砥柱。拜占庭一直成功地扮演了他们的角色，直到 11 世纪中叶东方的土耳其人兴起。与此同时，西方的诺曼人也开始尝试入侵拜占庭。拜占庭帝国陷入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以帝国意大利领土的失陷为代价，诺曼人终于被击退了；然而对土耳其人，帝国则永久性地失去了帝国的粮仓与兵源地——安纳托利亚（Anatolia）。<sup>[5]</sup>此后帝国一直面临两线作战之虞，而十字军运动的兴起令局面更加复杂。虽然作为基督徒，拜占庭人对十字军抱有好感，然而他们长期的政治经验证明应当对异教徒保持一定宽容并允许其存在。十字军倡导的圣战在拜占庭看来反而是危险的和不切实际的。

当然，拜占庭人也希望通过十字军获得好处。然而，这一切需要以实力作为基础。拜占庭继续以强权面目出现，不过其国力已经开始不断下降了。在那个充满战争冲突的年代，安纳托利亚的丧失，迫使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愈发依赖外国盟军与雇佣军，而后者是需要以商业特权或金钱作为代价的。这一切不幸又发生在帝国经济衰退的年代。整个 12 世纪，帝国看上去似乎依然是富裕和强大的，市场港口商贾如云，皇帝依然受到尊敬。但是，拜占庭既不支持穆斯林对抗十字军，也同样对十字军缺乏热情，这就埋下了忧患的种子。同时，11 世纪，宗教分歧也加剧了东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矛盾。<sup>[6]</sup>至 12 世纪，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已经明显地处于分裂状态了。

真正的危机是十字军带来的。1204 年，在军队领袖野心的蛊惑下，出于威尼斯人的嫉妒与贪婪，出于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的敌意，原本是去援救拜占庭帝国的十字军反戈一击，攻占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其废墟上建立了拉丁帝国。这一事件终结了东罗马帝国的强国地位，虽然其并未彻底灭亡。大约半世纪后，流亡至小亚细亚西部的拜占庭势力（即尼西亚帝国）夺回了君士坦丁堡，



击败了拉丁帝国。似乎拜占庭帝国又迎来了伟大的复兴。然而，米哈伊尔八世的政权（即帕列奥列格王朝，拜占庭末代王朝）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强盛。它还依稀保留了一些过去的威名，君士坦丁堡依然是“新罗马”，是东正教的中心。拜占庭皇帝，至少在东方人看来，依然是罗马人的皇帝。实际上，拜占庭已经沦为了一个普通王国，甚至在希腊人世界中亦不是唯一的统治者。在它的东面，有事实上独立的特拉比宗王国（由拜占庭科穆宁皇室后裔在1204年建立），后者拥有丰富的银矿和与大不里士（Tabriz）的传统商路。在色雷斯地区，出现了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同样由前拜占庭皇室后裔建立），它一度与尼西亚帝国展开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激烈竞争，甚至曾经兵戎相见，不过最终也走向衰败。在巴尔干，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成为另外两大势力。而在希腊本土与周边岛屿上，意大利人的殖民地与法兰克人的贵族领地星罗密布。为了驱逐威尼斯人的势力（其为十字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幕后黑手，遭到拜占庭人的普遍厌恶），拜占庭政府引入热那亚人，后者则要求贸易特权，首都北部的加拉塔（Galata，或称佩拉 Pera）商业区随即为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商人顺理成章地掌握了拜占庭商业命脉，<sup>①</sup>令帝国的财政进一步雪上加霜。而帝国四周可谓险象环生：在意大利有前拉丁帝国的复辟势力，巴尔干的斯拉夫王族们则觊觎着皇帝的头衔。东方的土耳其人一度沉寂了一段时间，这某种程度上也挽救了拜占庭帝国。不过在伟大的酋长奥斯曼的率领下，土耳其人很快再度成为了帝国的劲敌。因为西部的军事威胁，拜占庭不得不将多数财力人力投入其中，以致忽略了东部的防御，这为奥斯曼人在小亚细亚的扩张提供了良机。<sup>②</sup>

14世纪对拜占庭帝国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世纪。强大的塞尔维亚王国一度有并吞拜占庭帝国的趋势。而雇佣军卡特兰军团的叛乱（Catalan Company，即

① 现代通常称作“加拉塔”，与另一名称“佩拉”（pera）均可使用，不过“佩拉”更为官方正式。

② 关于当时一般的情况可以参见：Ostrogorsky,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trans. Hussey), pp. 425 ff.